

艺术·焦点



《广告狂人》还原旧日纽约，连续三年拔艾美头筹 一部电视剧与一个国家的私生活

余 敏 雨

在第62届美国电视艾美奖中,《广告狂人》连续3年拿下了剧情类最佳剧集和最佳剧本奖。消息一经传出,或许令一些中国的美剧迷怅然若失,《别对我撒谎》、《双面法医》、《迷失》等更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热剧再次败给这部收视率不及《绝望的主妇》零头的小众剧集。《广告狂人》究竟有何奇妙之处,能够如此得到艾美奖的青睐?

《广告狂人》最大的魅力,也许是它成功地复制了一个时代最为私密的生活质感。它以让人惊叹的精准细节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风俗及观念,给观众带来的是一种微妙却有力的怀旧,是内心深处比记忆更有力量的刺痛感。对于许多该剧的忠实“粉丝”来讲,《广告狂人》或许不单单是一部剧集,而更像是一个时间机器,无论追溯过去抑或映射现实,到达的都是那些会让他们再次疼痛的地方。《广告狂人》在艺术深度上的坚持在这个充满娱乐泡沫的文化语境下更显得难能可贵,也彰显了艾美奖重视质量不动摇的坚定立场。

行业剧的内涵延伸

熟悉美剧的观众大多都不会对行业剧感到陌生。美剧习惯性地挑选一个大众所感兴趣的行业作为创作土壤,无论是律师行业、医疗行业还是无所不能的“特工行业”,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容易激起观众的期待与遐想,以及强烈的好奇心。此外,这些行业往往能够轻易地融入对人际关系和人性的探求,在戏剧深度上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要想在发展已呈饱和状态的行业剧中另辟蹊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广告狂人》却抓住了以往美剧很少涉足的广告界,实则抓住了一块亟待雕琢的璞玉。

广告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早已经深入了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知是否有人专门统计过人每天所接受的信息里广告所占比例,但毋庸置疑的是,广告的确已经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广告行业也正日益成为现时代最有影响力的行业之一。广告界是什么样子的?广告公司的人是如何生存的?这自然成了人们好奇的问题之一。该剧副名的中文翻译“广告狂人”似乎是一个模棱两可的

答案,为广告从业人员复杂、暧昧、激越的生活状态作了注脚,同样也暗示了上世纪60年代物欲横流的纽约在经济上升时期狂热放纵而糜烂享乐的社会氛围。

《广告狂人》对于广告公司和广告人的描述,透射出的是整个美国社会的衍变与发展。剧中主角唐·德雷柏所供职的斯特林·库珀广告公司虽然是一个虚构的公司,但是在剧中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广告公司却不乏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剧中所反映的诸多历史问题如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遇刺、种族歧视等也同样有现实来源。随着剧情的展开,虚构的公司成长与真实的社会发展相互映衬,《广告狂人》作为一部行业剧的内涵也由此得以延伸——商战的硝烟与主角们吐出的烟圈交织混合在一起,在这团氤氲的笼罩里,黄金时代里人们蓬勃向前的精神本质被资本主义发展的冷酷巨轮无情碾过,人物命运的起伏和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在其间被勾勒出了曲折的线条。

难以言说的怀旧情愫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广告狂

人》能以如此优雅温和的方式去刺痛一个时代,唤起人们对旧时光的缅怀与追忆?笔者认为,正是该剧对于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细致描摹,对那个时代生活场面精雕细琢的刻画,才娓娓道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怀旧情愫。

故事围绕主角唐·德雷柏的生活展开,作为斯特林·库珀公司的创意总监,唐拥有的是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生活,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他的身边,有觊觎他地位的同事和同行,有强颜不留情面的妻子,有遭遇困境困扰的女儿,有层出不穷的各种情人。然而,剧中每一个人都饱尝

时代给予的烦闷与矛盾。

《广告狂人》敏锐地抓住了这时代的隐痛——资本主义社会在以一种狂奔的速度发展,而人们却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不安,他们开始惧怕许多东西。唐惧怕自己作为一个逃兵的真实身份会暴露,继而他会失去他现有的一切;佩奇惧怕她苦心编织的“美国梦”会在男权当道的现实中被男人粉碎;贝蒂惧怕她失去了对丈夫的掌握;导弹危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惧怕美国随时会毁于一旦;肯尼迪遇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惧怕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信仰会崩塌……

即便那个时代充斥着慵懒迷离的爵士乐和没有节制的疯狂派对与狂欢,尽管无尽的酒精流淌在每个人的血管里而人们也习惯于此慰藉,可是那种深重的不安与惧怕依旧无法散去,这是颓废的、摩登的、富于冒险精神的纽约和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在其间被勾勒出了曲折的线条。



1964年夏,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61班师生合影。

情并茂,充满泥土芳香。他后来成为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因为身体欠佳,上戏不多,多在教书育人。

我们班入学时是17名同学,开除了骗子李某以后,又因为学习成绩欠佳,淘汰了3名同学,毕业时仅剩下了13名同学。当时学院实行的是精英教育,因此才有如此严厉的淘汰制。

最后说说我自己。我上学时因为表演紧张,形体僵硬,受到过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扶;也因为勤于笔耕,获得过周伟老师给的全班唯一的5分;还因为办事认真负责,连任生活委员。毕业后曾在部队锻炼4年,后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8年,参加过《南海长城》、《奸细》、《解放石家庄》等6部军事题材故事片的拍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刚一成立,我便被召唤到于蓝厂长麾下,成为一名马前卒。我曾编导过《清亮的小溪》、《飞飞从影记》、《小骑兵历险记》、《荧屏奇遇》等9部儿童故事片和《少年林则徐》、《少年郑成功》等4部儿童电视剧。其中《孙文少年行》获得华表奖、金鸡奖、“五个一工程”奖和童牛奖。《弹起我的扎年琴》获得骏马奖。据业内朋友统计,我拍摄的儿童影视剧作品数量在中国导演中名列前茅。相信我的师弟、师妹们很轻易就会超过我这区区13部的数量,但他们必须坦然面对儿童影视编导名小利薄的尴尬处境。多少导演把儿童片当跳板,玩一把就走了!如果哪位师弟、师妹真的超过了我拍的儿童影视剧数量,我一定请他喝茅台酒!

妙地承载了这一切,所以,它获得了认同。

也许有人会觉得,非美国本土观众可能难以体会剧中的情愫,但实际上该剧的高妙之处也在于此,即便文化背景和经历不同,可是共同的对社会发展的反思却联通了大洋彼岸观众的理解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在当下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人们,更能理解剧中人对成功的不懈追求和因此而陷入的两难境遇。

需要细品的慢热经典

《广告狂人》是一部慢热的剧集。初看该剧的观众可能会因为

忍受不了第一季前几集慵懒缓慢的节奏而错失经典。然而一旦入戏,便会惊讶地发现该剧的剧作之巧妙,最激烈的戏剧冲突总是藏于琐碎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惊喜,人物关系与性格的描写也鞭辟入里、张力十足。

该剧剧作的一大特色是,总能在不经意间的人物行为及反应里传达出含蓄的批判或褒奖。比如第三季中,收购了斯特林·库珀的英国公司派来的新总裁遇工伤致残,斯特林本人却在众手下面前调侃了起来,这群商界精英的冷漠与无情在嗤笑声中暴露得淋漓尽致;比如第四季中,佩奇·奥尔森在酒吧和她朋友谈论到反对种族歧视的问题时,佩奇却勇敢地指出作为一个女人她所处的境地并没有比黑人好到哪里去,女权意识犀利地闪现,也透露出那个时代对于男女平等的要求更加迫切。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的广告创意也是主创聘用专业的智囊团共同设计,许多案例都叫人拍案惊奇,广告公司的运作与广告创意诞生的细致展现更是引人入胜。

艺术·视野

2000年11月,女诗人翟永明写下了她在柏林的最后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她第一次看到在二战中险些成为废墟的威廉大教堂,像一个饱受折磨的美妇人站立在柏林最繁华的一条街上,伤痕累累,风采依稀。她写下:“轻伤的人/从此拿着一张重伤的地图。”

翟永明的诗是写给记忆的,城市与建筑的记忆,既不同于史实,也不同于虚构。她说: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柏林一样,以沧海桑田一样的城市肌理来记载一个世纪的变化。一条165公里长的真空隔离带将城市的身躯一剖为二。一半涂鸦,一半艳妆,东西柏林的伤口被一个看不见的纱布裹在一起,其体内的脓水一直溃烂了若干年。

看了周兵导演的纪录电影《外滩佚事》。那条包裹伤口的纱布,或者说是那条蜿蜒动人的历史江流,以性感而沧桑的姿态,撩开了外滩鲜血汩汩的创口。

“外滩”这个意象在片中被赋予生命力,解说词做了第一人称的拟人化处理。鬼魅而低沉的男低音,让人想起《夜访吸血鬼》中在人间偷生400年仍芳华绝代、惊情骇骨的布拉德·皮特,年轻貌美如斯,讲述之神韵却苍凉出世,五蕴皆空,它是被施与不老 的诅咒,看透浮世烟云的暗夜之眼、冥冥之音。

在它的话语中,赫德、叶澄衷、杜月笙、李善兰、周璇都是“孩子”,那些上海传奇人物的命运在它的眼中,和外滩开埠以来亲历过的所有霓虹与血腥、炮火与烟花一样,渺如微尘,随着流年泥沙俱下,经年冲积,不过是江底又一层薄薄的历史。

而不可否认的是,“人”的传奇、创举以及政争、屠戮却对城市的肌理进行了深刻彻底的塑造与摧毁。翟永明说:城市是无辜的。它对战争无知无觉,对人事兴亡和江山更迭也无动于衷,对生死爱欲也茫然不顾。城市的所有沧桑繁华,气象万千,以及劫难损毁,都是人强加给它的。当我们回顾一段地方历史的时候,总习惯用人的故事去还原历史的生命力和真实感。而讲述人史,往往会从旧地和旧物说起,历史的质感从旧迹的死讯与生机中,重新焕发时光之泽。人和地成为一对双生的坐标,互为意义,历史就这样跃然纸上。

在地理概念中最为显著的,

就是城市。人,创建城市,又任意地摧毁它,并不把它当成生命。政治家所谓“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翟永明说,城市(一般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文脉、历史、象征)在战争中受到的内部重创是被轻视的,是一种现实中的“轻伤”。

所以,《外滩》的讲述风格,表面看来是“轻伤的城市,重伤的人”,其精神内涵实为“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历经劫难的城市,接受着自它诞生以来人的创建和戕害,又不计遗憾地安抚在它怀中长眠的生命个体,如果城市有生命,它该骄傲自己身不由己的长生不老,还是羡慕人类恣意妄为的脆弱苦短呢?

如果外滩有生命,它应能感受到历史上一次次来自海洋文明的冲击,和从远古内陆高原奔流而下的大河气韵,两股洪流在它的静脉里疯狂地澎湃碰撞,或是馥郁交融,或是奔腾咆哮、血流成河。

上海,就这样一次次从自己酷烈创痛的伤口上,完成了颠沛流离的全身大换血。

每一座城市,都有着如此分明的性格,都自成一脉传奇。仍记得两年前,在大学课堂上看到国内独立导演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和课上所有热血沸腾的学子一样,我震撼于影像追求真理的力量,和正历史的使命。从《大国崛起》、《成都建川博物馆的非常记忆》到《国殇》,能够感受到

是中国大众纪录片为客观历史思辨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诚意。主流历史观自古以来都以“人”作为出发点,只有文人墨客时而寓情于景,忆古思今。感怀着“物自盛而人自衰”“古人不识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念桥边芍药,年年知为谁生”“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在他们笔下,无情的是明月、芍药和杨柳,有情的,都已作古。殊不知,明月传恨有时,芍药含悲有时,杨柳垂泪亦有时。

英国传媒学者约翰·伯格认为:在时间和历史合二为一以前,历史的变化速度是如此之慢,以至于个体认识到的时间流逝和历史的变化截然不同。如果我们相信伯格所说,没有一种普遍认可的价值比人的一生寿命更长,那么我们能够欣慰地看到,历史永远可以被未来重新正名。

此刻,城市的脉,振振有词地纪念着人的牺牲。沉默的历史,却以人作碑,以一种振聋发聩的寂静,纪念着城市之殇。

艺术·剧评

电视剧《晚婚》： 给一个结婚的理由

忽 忽



38岁仍待字闺中的小姑,与大步流星狂奔“三张”的两姐妹各有不同的情感困惑,但奚美娟饰演的单亲母亲徐家蓉比她们本人压力还大,不停催促她们早日成婚,然而这美好的愿望——落空。

为迎合家长的愿望,两女儿半自愿半被迫地走上“闪婚”之路,过程鸡飞狗跳,结局鸡飞蛋打。小姑子当了第三者,转正未遂,两个女儿也不让人省心:“我家老二,是我心疼的,折腾到现在,被个穷小子给用了,我家老二呢,找了个农村的,我们家倒贴了钱,也没嫁出去,现在倒好,人家玩起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你说我怎么办哪,我总不见得把我婆婆嫁出去吧,她都八十了。”

故事最后,该结婚的一个没成,反倒是徐家蓉玩了一把黄昏恋,成功走入婚姻殿堂,让人大跌眼镜。真正印证了《晚婚》里那句经典台词:“我觉得这结婚吧,就跟人类类呢?合子不是要被砸了?《晚婚》把阴盛阳衰的故事夸张放大,它让5个女人——奶奶、妈妈、小姑和两姐妹生活,同一屋檐下,一老奴,一中年妇女,还有三个大龄文艺女青年,光听这家庭成份就足够吊人胃口。

回忆我们的导演系六一班

卢 刚

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迎来了建院60周年的大喜日子,而我们导演系61班也将在明年9月迎来入学50周年之日。50周年,整整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已经历尽沧桑。

我们导演系61班的班主任是周伟老师。她睿智慈祥,仪态万方,曾经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演员和导演。为了培养我们,她披肝沥胆,废寝忘食,舍弃了多少名利双收的上戏机会。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为了甩掉

“保皇派”的帽子,违心地批斗了她,使她身心备受煎熬。我至今想起来还深感愧疚!周伟老师已是94岁高龄了,近来因病住院,我们盼望她早日康复!诚如丁荫楠所说:“谁说周伟老师没有作品?我们就是她最好的作品!”

我们班的老大哥丁荫楠是当年唯一带工资上学的同学。他沉稳老练,社会经验远比我们这些刚迈出中学校门的同学丰富,被大家尊为学长,有了为难之事都愿意向他请教。他当年表演的无实物小品《显微镜下》充满生活气息,把当化验员的工作体验都用上了。他是珠江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他导演的故事片《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幼皆知,深入人心,获奖无数。他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再说说我们班的小弟弟郑洞天。入学时因为年龄小(只有17岁),险些被拒之门外,是周伟老师慧眼识金,据理力争才收留下来的。郑洞天勤于思考,博学多才,在我们班连任学习委员。如今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博士生导师。他早期导演的故事片《邻居》荣获金鸡奖,被视为第四代导演的扛鼎之作,确立了“纪实美学”的风格。郑洞天继续周伟老师的优良师德,为培养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虽然心脏安了7个支架,如今虽然心脏安了7个支架,如今依然在为培养第七代导演呕心沥血。

我们班的3位女生也个个巾帼不让须眉。蔡晓晴曾任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秉承了其父蔡若虹的革命艺术家本色,为人公道正派。她是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全国“三八”红旗手,她导演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中国姑娘》、《家教》、《三国演义》(部分)、《文成公主》等深入人心,获奖颇丰。广春兰是我们班唯一的少数民族同学(锡伯族)。她好胜心极强,从不服输,如今是天山电影制片厂导演,也是中国影协新疆分会副主席。她导演的影片《不当演员的姑娘》、《买买提外传》、《火焰山来的鼓手》等获得过许多奖项。我们班的“班花”柳青入学前就已经在新中国第一部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中扮演过主要角色。她曾自编自

导了故事片《追索》,后出国定居,在海外创建出版社,著书立说。最近她回国参与投资史诗巨片《辛亥革命》,仍然在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尽力。

我们班还培养了两位厂长:一位是马秉铨,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他是烈士子弟,为人随和乐观,从不以身世骄人。他导演的故事片《少年彭德怀》曾获童牛奖等多种奖项。另一位是金铎武,曾任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身高体健,是我们班的灌篮高手。他和夫人葛晓英联合导演了《严风英》、《世纪人生》、《徽州女人》等多部电视连续剧,反响颇佳。

我们班有过3任班长。第一任班长兼团支部书记李某。此人胆大包天,竟敢冒充某首长的警卫员,骗过院、系领导,混进电影学院,并坐上了我们班头把交椅。可叹入学不久便东窗事发,被请进了公安局。因为走得太急,连张照片也没留下。可见骗子早已有了之,并非今日特产。第二任班长是史践凡,其父史行是著名话剧艺术家。史践凡深受其父熏陶,聪明而又自信。他是多产的电视剧导演,曾和夫人奚佩兰联合执导《鲁迅》、《铁血共和》、《西行漫记》等多部电视剧,获得各方好评。其中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是由我编剧的。第三任班长是于世彬,为人忠厚质朴,是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后来兼职教学。

曾在班上和我结过“一对红”的彭宁是老红军的后代。其父彭加伦1925年就参加革命并入党,曾任中央军委政工部副部长。彭宁曾是“造反派”领袖,后来被打入牢狱。出狱后,他痛定思痛,导演了控诉极左路线摧残人性的故事片《苦恋》。如今他已撒手人寰,而他的灵魂却仍然苦苦眷恋着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

我们班的张泽宇入学前曾在上海获得过击剑健将的称号,毕业后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业余钻研股票,颇有建树。他写的《股票分析指标大全》成为许多股民的案上宝典。马绍惠来自陕北,淳朴善良,能歌善舞。他和叶向真(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导演系59班学生)在学院礼堂合演的《兄妹开荒》声